

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鸿 志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赢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在积极倡议和领导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和杰出的实践活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些简要的论述，竭诚欢迎专家以及读者批评指正。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由于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曾受过国际的很大影响。但是中国极为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也使中共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得出了自己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为以后建立自己完整的、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国际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完全照搬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在中国革命中推行了一条“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在观察世界时，他们也总是把帝国主义国家武装进攻苏联看作是世界上最严重、最紧迫的危险，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坚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的前奏，不顾客观实际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

联”的口号，造成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后果。然而，就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对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早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就认真研究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正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①国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中国统治阶级中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派别之间不断发生分裂和斗争，引起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②。而中国的红色政权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当“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最终必将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观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产生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而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策略思想，并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均势一旦失去平衡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作出了正确的预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之后，自然而然地把利用国际矛盾的思想与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统一起来。在一九三五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认

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这就有可能使英、美等国和依附于英、美的那部分反革命力量发生变化，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③，进而为建立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条件。毛泽东在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则更加生动形象地指出：“当斗争是向着日本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④根据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并以国际统一战线来加强和巩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因此，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中国应“在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反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随着日本侵华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⑤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把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到了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之中，从而初步越出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制度、以至于

对苏联的态度来划分世界阵线的思想藩篱。虽然由于当时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姑息迁就政策和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使中共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在一时未能取得重要的成果。但中共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在争取欧、美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方面仍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在争取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终把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统一战线的基础，没有单纯从保卫苏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共曾多次强调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无论将来日本南进或是北进，“其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⑥。因此，中国共产党不能因国际形势的某些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重点，并要坚定地确立“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的方针”^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共产国际改变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也同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将欧战定性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中共接受这一理论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除了共产国际的崇高威望，以及中共对欧洲的事务尚缺乏足够的了解等原因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起因，确是帝国主义集团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特征当时尚未完全充分暴露出来。其次，随着欧洲形势的紧张，英、美等国当时正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稳住日本。这就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使得中共认为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已最终拒绝了与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结成反法西斯的抗敌同盟，而是决心组成自己单独的帝国主义战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无可争议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但不能要求中国共产党像欧洲各国党那样奉

行反战政策，反而因为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危险，而要中国通过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来推动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以便把日本牢牢地拖在中国。因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虽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目标侧重点与具体策略手段上有着微妙的差异，但双方在总的战略方针上还是并行不悖的。这也决定了中共虽然接受了那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

从苏德条约的签订到德苏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一直沿用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并为了解释苏联的外交政策，反击国内外反苏、反共势力的挑拨和攻击，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然而仔细研究一下中共的观点，就可发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仍有着相当的差别。在欧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曾经作了一次题为《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部讲话，主旨是向广大党员解释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其中也沿用了“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要“特别反对英帝国主义这个强盗魁首”^⑧等共产国际的理论观点。但就在这篇演说之中，毛泽东对欧战爆发的直接起因却做了与共产国际口径不同的解释。共产国际认为：只是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英、法因为“已无法再希望德国发动反苏战争了”，所以才“转向以武装斗争反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的道路”^⑨。而毛泽东则认为，实际上英、法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前就已经下决心对德开战，所以才没有与苏联订立军事协定。它们“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不是证明别的，只是证明张伯伦已经决心作战了。所以大战的爆发，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而且是张伯伦要打的，因为如果真要避免战争，就一定要苏联参加才行。”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与共产国际突出英、法的反苏阴谋不同，

他在这里更多地强调了英、法与德国矛盾的尖锐性和它们打垮德国的决心。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在一般地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只突出强调它们在反苏、反共方面的共性，而是坚持了他一贯重视研究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科学分析方法。由于这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注重观察研究世界战局的演变，及时把握可能发生的矛盾变化，并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利益出发根据这些变化不断调整中共的内外政策。当法国战败投降之后，中共中央及时指出：日本与英、法之间的矛盾必然急剧上升，“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⑩而“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⑪我们虽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但“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⑫，并且“在宣传中必须指出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与投入一派帝国主义怀抱两者的区别”，表明“我们并不反对站在独立战争的立场上，利用英美的借款。”^⑬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表明，中共当时虽然仍继续把欧战看作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但已经开始注意了利用英、美的问题。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远在美国参战之前，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仍然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已经敏锐地认识到美国与德、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在一九四〇年七月，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事实上“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所以，战争是不会很快结束的。“假令英国屈服，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而“德、意与日本，不破坏英、美的海军，是无法管理英、法、荷、比的殖民地的。”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我们则“必须利用之”^⑭。事实果如毛泽东等所料，日本很快于同年九月南下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同月与德、意正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从而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与美国武装对抗的道路。其间虽因德国威胁的增长，美国对日妥协的倾向一度有所上升，但双方在太平洋上的争夺终究无法调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也最终完全破产。客观形势的这种发展变化，已预示着中、英、美三国必然在对日问题上形成同盟，中共也必须调整自己对英、美的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毛泽东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明确表示：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进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⑮这一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实际上已经开始按侵略战线与反侵略战线划分世界阵营，事实上放弃了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对外政策，并重新开始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探索。

（二）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世界战争的形势，完全澄清了世界上两条对立战线的格局，也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从理论上重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进行再认识。由于在思想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准备，所以中共能够十分及时和顺利的实现了向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转变。在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

战线》的指示，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建立国内、国际的两条统一战线，这包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同时“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⑯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又在一份党内指示中直接了当地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⑰。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已经开始改变了对当时英、德之间战争性质的看法，初步肯定了英、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的进步作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又及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进一步明确肯定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⑱。正式确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进行的战争也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完全突破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划分世界战线的传统观念。宣言发表的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⑲。根据这一指示，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对英、美人士的统战工作，成功地争取了大批美国在华军政人员，进而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中共在抗

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对于以后约束国民党政府的反共行为、制止新的反共高潮的发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战略思想，可以发现两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一是在观察国际事务时始终注意全面考察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努力从中发现一切于我有利的可能；一是在积极争取外来援助的同时，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思想，坚持以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为建立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标准，坚持把争取胜利的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由于坚持了这两条原则，使我党在当时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直保持了头脑的清醒，从而多次避免了在紧要关头遭受重大损失。在《苏日中立条约》签定之后，中国国内的反共势力曾掀起了一阵反共、反苏的喧嚣，广大人民群众也有不理解的怨言，一度给中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但是由于我党早已确立了独立自主坚持长期抗战的持久战略，从未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对日作战之上，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共广大党员并未因这一冲击而陷入思想混乱，反而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出发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向群众耐心妥善地做了解释工作。同样，当德军侵苏初战得手之际，国内外的很多人都认为日军必定会乘虚北上，日本关东军也举行“特别大演习”摆出了一副进攻的姿态，这在当时也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共产国际多次来电，强烈要求八路军立即向东北采取攻势，以牵制日本可能的北进；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也幸灾乐祸，妄图借此机会压迫我军向北收缩。而中共中央领导人依照自己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究和分析，认为根据日本与美、英矛盾的激化，苏德战场态势的演

变，以及日、德之间战略目标的不同，可以得出日军南进的可能大于北进的判断。因此，中共中央虽然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了一定的准备，但是并没有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立即出兵东北。而是从我军实际情况出发，对与苏军配合作战的问题采取了既做积极准备、又取稳妥慎重的长期斗争方针，避免了一次可能的重大损失。^②上述两个事例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注重于对世界全局的把握，而没有简单地只从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单一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更没有把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希望完全建筑在苏联力量的基础上。正是由于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通过正确判断世界主要矛盾和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圆满地解决了如何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结合在一起的问题，从此开始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地，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为原则，以反侵略、反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

在迄今为止的数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世界主要矛盾，坚持以反帝、反霸为划分世界阵线的主要标准，不断发展完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思想，为争取和捍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基本经验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101页。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③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605，第617页。

④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⑤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2 页。

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0 页。

⑦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 页。

⑧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3、475 页，第 472 页。

⑨见《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8 页。

⑩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⑪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 页。

⑫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 页。

⑬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 页。

⑭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7、288 页。

⑮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64 页。

⑯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6 页。

⑰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7 页。

⑱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8 页。

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1、252 页。

⑳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9 页。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出版

我系黄宗良教授和林勋健、叶自成两位副教授共同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已于今年 9 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参加编写的还有沈青兰、唐士其等 8 位教师、研究生。这是多年来结合教学集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全书共分 4 编(14 章)，分别叙述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产生及其在 19 世纪的发展；19 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80 年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走向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从内容看，有这样几个特点：(1) 对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内在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前三编的第一章都着重论述了当时的科技革命对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2) 不仅系统地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对 9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和发展趋势也作了评述，并就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3) 不仅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如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也作了适当的评介。

(仁 之)